

政治服务、社会服务与历史记忆： 新世纪中国档案媒体形象

谭必勇 邹燕琴

摘要 档案媒体形象是档案社会地位的重要体现,而主流媒体塑造的档案媒体形象会影响公众对档案工作的态度和意见、甚至公众的个人行为。2000-2017 年中国六大主流媒体的档案报道表明,档案媒体形象即为政治服务的幕后者、为社会服务的公益者和历史记忆的保管者。现有档案媒体形象的问题需从两方面解决:一是双向对话即媒体合作与公众交流,二是主动优化即主动传播与多元服务。

关键词 媒体形象;档案报道;主流媒体;历史记忆

中图分类号 G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0)02-0113-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TQ045)

主流媒体对档案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成功的档案媒体形象不仅能够提高档案机构、档案工作者的自我认同,也能增强档案群体的社会认同、提高档案职业的社会地位。本文研究的档案媒体形象是指新闻媒体通过对档案相关事件进行议题选择、信息加工、重新结构化并传播后,被媒体受众及社会大众认知的档案形象。这种形象也会受社会环境、认知主体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笔者以“档案+形象”为检索式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主题检索,不限时间范围,共检索出 491 篇文献,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档案馆的公众形象^[1](P16-20)、档案工作者的职业形象^[2](P27-32)、档案工作的社会形象^[3](P70)等方面。但是以“档案+媒体形象/媒介形象”组成检索式分别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上进行主题检索,不限时间范围,只检索出 141 篇文献,并且筛选后仅发现 2 篇直接相关文献。可见,虽然目前我国档案界对档案形象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关于档案媒体形象的直接研究少之又少,然而主流媒体对档案形象的构建会较大程度上影响公众对档案的态度和意见。因此,笔者主要通过研究 2000-2017 年六家中国主流媒体对档案的新闻报道,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对档案报道的数量、方式和主题进行分析,研究主流媒体关于档案的新闻更关注哪些性质的议题,分析主流媒体档案议题设置的深层原因,得出主流媒体最终塑造的档案媒体形象,以期能够更客观全面地反映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构建更完善的档案事业体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研究数据与方法

为了尽量保证研究的客观性、数据的全面性和权威性,笔者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公布的《2016 年中国报纸十大品牌企业排名》^[4],剔除了国际性的和档案报道数量较少的报刊,最终选取了《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和《扬子晚报》这六家主流媒体作为数据源。通过慧科新闻数据库,以“档案”为检索词进行标题检索,时间跨度为 2000-2017 年,限定媒体为上述六家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扬子晚报》的数字报,共检索出档案

报道 3408 篇。以这 3408 篇新闻报道为研究样本,笔者采用文本分析法,建立 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模型对新闻进行文本分类,最后从档案报道的数量、形式、主题三个方面对中国主流媒体呈现的档案媒体形象进行解读。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通过收集我国六大主流媒体 2000-2017 年间所有的档案报道,以图表的形式阐释主流媒体对档案的报道情况;另一方面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建立 LDA 模型对新闻进行文本分类,研究主流媒体档案报道的主题分布及其原因,从而深入分析主流媒体呈现出的档案形象。LDA 模型是一种包含词、主题、文档 3 层结构的贝叶斯概率模型^[5] (P993-1022),能更精确地把握主题识别过程,并对主题分析以及主题预测有很好的效果^[6] (P100-103),因而被广泛应用于新闻话题挖掘及其演化^[7]、新闻文本分类^[8] (P202-203)、新闻推荐^[9] (P1022-1037) 等方面的研究。如图 1 所示,笔者以 3408 篇档案报道为考察对象,对非结构化的新闻文本进行初步处理后,将每篇新闻正文进行分词和去除停用词,获得档案新闻的关键词。在此基础上,建立 LDA 主题概率模型,采用 Gibbs 抽样获得主题概率分布,对新闻进行主题识别和聚类,以尽可能对档案报道的主题进行客观分析和准确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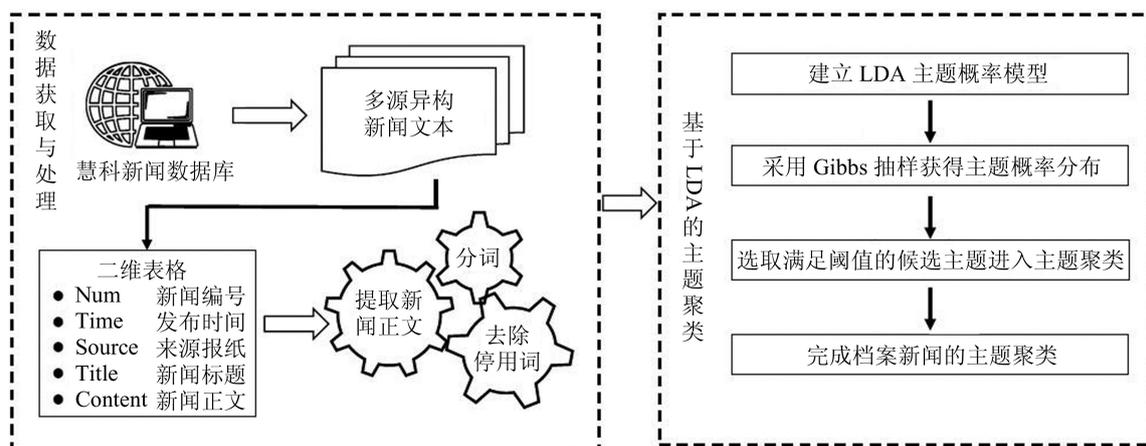


图 1 档案媒体报道主题聚类分析框架

二、2000-2017 年主流媒体档案报道概观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沃尔特·李普曼研究提出“拟态环境”理论,认为现代人大多是通过新闻媒介来了解世界,指出人们受到自身活动范围及条件的限制,很难对外界的与己有关的诸多事物都逐一经验接触,而新闻机构则可以使他们了解那些超出自身经验感知的部分^[10] (P162-168)。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议程设置理论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指出,议程设置的核心论点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新闻中强调的那些议题将会成为公众认为重要的议题。换句话说,媒介议程设定了公众议程”,显著性也由媒介议程转到公众议程^[11] (P9),这种客体层面的显著性转移是传统议程设置。另一个层面则是属性显著性的转移——属性议程设置,议程上的每个客体都有许多属性,即充实每个客体图像的那些特点与性质^[11] (P59),比如报道角度、报道体裁等新闻报道特点能够将新闻客体本身转移到新闻受众上(见图 2)。进一步说,“媒介也许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在告诉读者去‘想什么’方面却惊人地成功”^[12] (P243)。由于主流媒体的发行量大、社会信誉好、影响力大和权威性高,且主流媒体的专业优势与人才优势明显,拥有一大批忠诚且更易于接受并相信其发布的信息的受众,因而通过议程设置理论对主流媒体的档案报道数量、形式及主题进行深入分析,能够更好反映出公众对议题内

容的具体看法, 较好地呈现出档案的媒体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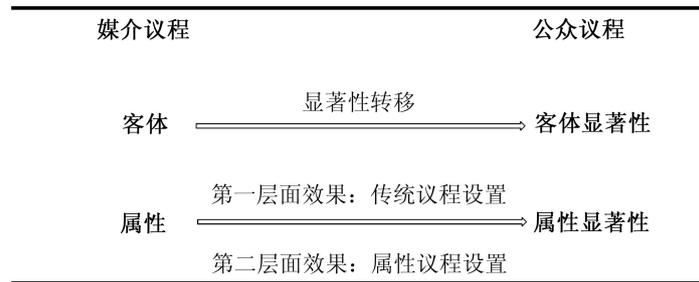


图2 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的议程设置^[11] (P60)

(一) 档案报道的数量

根据“属性议程设置”理论, 媒介能够通过强调某些属性或弱化其它属性来影响公众对议题内容的具体看法, 而媒体的报道数量多少是影响公众对议题内容重视与否的重要因素。新闻媒体的报道数量能够很大程度上体现报道对象在社会中的地位, 直观地反映新闻媒体对报道对象的关注度。因而笔者把这3408篇新闻报道按照不同年份和媒体分布情况进行数量统计, 数据分析结果见图3。如图3所示, 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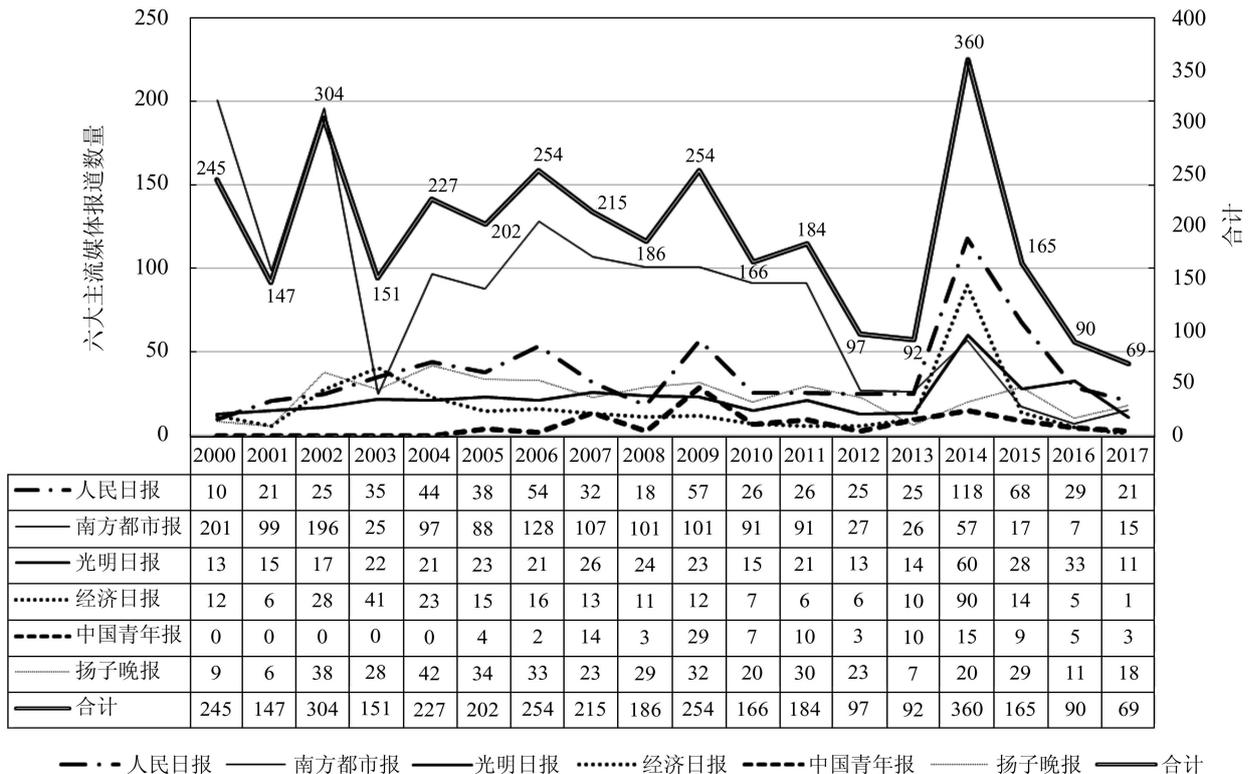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六大主流媒体档案报道数量情况统计图

六大主流媒体中,《人民日报》最低报道数量为2000年10篇,最高为2014年118篇;《南方都市报》除2003年仅有25篇外,2000-2011年报道数量均不低于88篇,最高201篇;《扬子晚报》和《经济日报》报道数量较少,年平均报道数量分别为24篇和18篇,但《经济日报》2014年高达90篇;《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数量最少,2000-2004年没有相关的档案报道,最高的是2009年的29篇。总体而言,除个别年份

外,档案报道的数量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2002年和2014年主流媒体对档案的报道数量占有所有报道总数的19.48%。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关联度较高。2002年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加快建立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档案,使有不良行为记录者付出代价^[13]。信用体系的建设要以信用档案的建设为依托,这是我国政府在进入WTO以后改善社会软环境的重要策略,因此信用档案受到较大的关注,2002年相关报道数量也较多,如《信用档案与信用约束》(《光明日报》2002-05-25)。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中日关系也受到“钓鱼岛事件”的影响而日益紧张。2014年1月9日,《南方都市报》首先刊载了《吉林公开一批日军侵华档案》的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扬子晚报》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日军侵华的档案报道,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受理中方关于南京大屠杀等档案申报》(《扬子晚报(数字报)》2014-06-13),《侵略罪行 铁证如山——吉林省公布日本侵华档案最新研究成果》(《人民日报(数字报)》2014-07-06),《〈伟大胜利——中国受降档案〉陆续发布》(《经济日报》2014-08-16),《国家档案局推出〈南京大屠杀档案选萃〉第六集〈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案罪行的调查与证词、判决书〉发布》(《光明日报(数字报)》2014-12-13),这些报道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由此可见,媒体对档案主题的报道数量往往与重要历史事件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从图4可以看出,《南方都市报》对档案的报道总数远远超过其他媒体,一共报道了1474篇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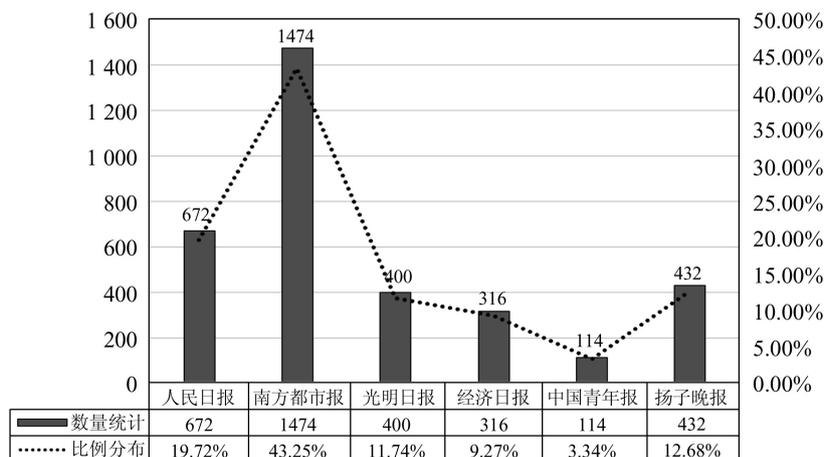


图4 2000-2017年中国六大主流媒体档案报道数量分布图

占有所有档案报道的43.25%,其次是《人民日报》,为672篇,占19.72%。《扬子晚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报道了432篇和400篇,分别占12.68%和11.74%。《中国青年报》关于档案的报道最少,只有114篇,占3.34%。《南方都市报》是广东唯一省级综合类大型城市日报,是中国版数最多、珠三角城市群区覆盖最密集的都市报。正是由于《南方都市报》是综合类大型城市日报,档案又与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其在国际新闻、广州新闻、深圳新闻等不同版面,以国际档案、人物档案等为主题进行了大量报道,内容涉及时政、社会等方面的档案新闻和名人档案。《人民日报》对档案相关的报道较多,排在这六大主流媒体的第二位。

(二) 档案报道的方式

由于媒体的信源、意识形态以及媒介涉及的话题有差异,媒体的新闻框架也各有特色,报道的新闻构架要素(主题、版面、词频等)又反映了媒体宏观的、固有的认知及思想倾向,因此主流媒体的新闻构架要素的设置情况,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主流媒体对该报道主题的重视程度,并进一步影响读者对该主题的认知与态度。因此研究各大主流媒体中档案新闻的报道版面、篇幅和词频,能够较好地呈现出档

案的新闻媒体形象。

1. 报道版面分布。报纸版面是受众直接感知的地方, 报道对象的版面位置往往能够反映报道对象的重要性, 体现该报道对象在主流媒体中的地位。由于《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的档案报道占总数的 62.97%, 且媒体代表性较强, 笔者对这两大主流媒体的档案报道进行版面频次分析, 研究结果见表 1、表 2。如表 1 所示, 《人民日报》对档案的媒体报道共计 672 篇, 除去其他这一版面, 版面频次最高的为要

表 1 2000-2017 年《人民日报》档案报道版面频次表

版面	频次	百分比
要闻	190	28.27
政治	84	12.5
政治新闻	29	4.32
文化	26	3.87
视点新闻	25	3.72
社会	20	2.98
文化新闻	20	2.98
综合	17	2.53
经济新闻	14	2.08
国内要闻	13	1.93
其他	234	34.82
总计	672	100

闻, 共 190 篇档案报道, 占总数的 28.27%。其次是政治版面、政治新闻版面和文化版面, 政治版面一共有 84 篇报道, 占 12.50%; 政治新闻共计 29 篇, 占 4.32%; 文化版面共计 26 篇, 占 3.87%。《人民日报》主要将档案议题设置在要闻版面, 这侧面反映了档案在新闻媒体中的重要地位。同时,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 随着时间的变化, 《人民日报》在新闻中强调的那些档案议题将会成为公众认为重要的议题, 这也有利于提高档案的公众认同。报道版面次之的是政治, 这说明档案与政治的相关性最强, 因而媒体塑造的档案形象自然也会反映出较强的政治性。由于《南方都市报》在不同时期的报道版面名称差异较大, 其对

表 2 2000-2017 年《南方都市报(全国版)》档案报道版号频次表

版面	频次	百分比
A	1050	71.23
B	125	8.48
C	107	7.26
D	39	2.64
TMP	6	0.41
E	1	0.07
其他	146	9.91
总计	1474	100

档案的媒体报道版面分布较为分散, 包括国内、国际、城事、国际新闻、广州新闻、深圳新闻等上百个不同的版面, 因此笔者对档案报道的版号进行统计分析。《南方都市报》在国内首创分叠出版模式, 每天出版 A、B、C、D 等叠, 其中 A 叠以时政和社会新闻为主, B 叠以娱乐新闻、体育新闻和文化副刊及赛点周刊(周六)、地球周刊(周日)为主, C 叠以经济新闻、声色周刊(周日)为主, D 叠、D2 叠、B 特叠(周四)以生活消费资讯为主(分为广州杂志、深圳杂志等)。如表 2 所示, 《南方都市报》的档案报道以 A 叠为

主,共计1050篇,占71.23%。这一方面反映了《南方都市报》在对档案新闻的甄选与传播方面多关注于时政与社会领域,另一方面这样的新闻报道模式最终会将这种显著性转移到公众议程上,从而对公众的认知与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公众逐渐形成档案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观念。

综合《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版面分布情况可以得出:从版面地位上看,档案报道主要被刊载在要闻版面,这说明档案在中国主流媒体中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主流媒体强调的档案也将影响到公众对档案的认同程度;从版面主题上看,档案媒体报道以政治主题为主,社会次之,主流媒体将最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与档案相关性较强的时政与社会领域,塑造出档案较强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形象。

2. 报道篇幅统计。新闻媒体报道的篇幅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报道的深度。按照新闻体裁可以将档案媒体报道分为短消息(篇幅在500字以内,特点为简要迅速)、消息(篇幅为500-1500字,比短消息略详细)、通讯(篇幅为1500-3000字,比消息叙述较为详细、具体)和长篇报道(篇幅在3000字以上的调查性报道)。如表3所示,我国主流媒体的档案报道以0-500字的短消息为主,共计1920篇,占总数的56.34%。其次是500-1500字的消息,共有1179篇,占34.59%。1500字以上的媒体报道只占9.07%,其中1500-3000字的通讯体裁新闻报道居多。目前的档案媒体报道侧重于简要而迅速地报道档案相关事实,不做过多的具体描述。比如《“八千麻袋档案”的生命史》(《南方都市报(全国版)》2012-03-11)一文共858字,主要介绍了“八千麻袋档案”的命运和《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一书的概要。主

表3 2000-2017年主流媒体档案报道篇幅

篇幅	数量	百分比
0-500	1920	56.34
500-1500	1179	34.59
1500-3000	243	7.13
3000以上	66	1.94
总计	3408	100

流媒体对档案的长篇报道较少,更缺乏系统的档案深度专题报道。主流媒体的长篇报道以名人档案和重要历史事件为主,名人档案如《党和国家档案事业的奠基人——回顾周恩来同志对档案事业的历史性贡献》(《人民日报(数字报)》2016-06-14)全文共5707字,该新闻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回顾了周恩来同志在中国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对党和国家档案事业的开创、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详细地描述了周恩来同志是如何在建立中央文库和中央档案馆中发挥重要作用、又是如何开创性地确立了新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重要历史事件如《用历史档案还原历史真相——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综述》(《人民日报(数字报)》2014-04-26)全文共7921字,这篇新闻报道了吉林省档案馆当时新发掘整理出一批日本侵华档案,并重点研究了其中的日军侵华罪行的铁证89件,主要涉及日军强征“慰安妇”、向731部队“特别移送”人员、实施南京大屠杀、残酷奴役劳工、对中国军民实施种种暴行、对我国东北地区实施移民侵略、囚禁审讯虐待美英战俘、镇压东北抗日联军等内容。这些长篇报道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公众对档案的认识,但“被动被传播者几乎完全不具有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一些被动被传播者希望传达的话语、话题,并没有引起大众传播媒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的关注,或者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也就出现了传达缺失”^[14](P176)。

3. 报道词频分析。主流媒体报道的词频能够反映出新闻报道内容的侧重点,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媒体更加关注哪些档案议题。笔者对这六大主流媒体的档案报道进行报道词频统计,除去档案这一检索词,词频统计结果如图5。如图5所示,在主流媒体的档案报道中,工作、中国、档案馆出现频率最高,管理、服务、历史等词也有较高的出现频率,其中工作出现频次高达5109次,中国、档案馆、管理出现频次分别为4563次、3292次、3236次。词云中所有词语的词频都在800次以上,因此,媒体塑造的档案形象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成立了“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课题”^[17]。但如图7所示,2002年社会信用档案报道高达130篇,主要原因是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家“十五”计划报告提出“进一步发展市场体系,在全社会强化社会信用意识,加快建立健全信用制度”,2001年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政府分别对不讲诚信的企业进行曝光,掀起了重建信用的热潮,被业内人士称为“信用年”^[16](P54),因而2002年诚信档案成为新闻媒体的报道热点。2006年,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正式建成并实现全国联网运行,此后报道热度逐渐降低。2014年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社会信用档案报道略有增长。总体而言,主流媒体更侧重于报道政务诚信档案和社会诚信档案,一方面是因为政府重视社会信用,建立了一系列信用制度,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诚信档案与个人息息相关,公众对政务是否诚信的关注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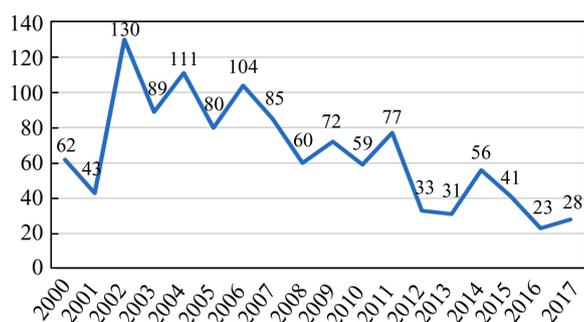


图7 社会信用档案主题报道数量分布图

2. 档案工作。档案工作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相关报道共计835篇,主要包括档案馆工作、档案会议、档案信息化等方面。关于档案馆工作,涉及了档案的接收、征集、保管、编研、利用、公开、宣传等档案业务以及新馆建设等,如《存真求实 鉴往知来 服务时代 我国档案馆将建成“两个基地一个中心”》(《人民日报》2000-10-25)《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光明日报》2000-12-11)。

3. 名人和国际历史档案。主要包括公开的国内外著名人物档案和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重大事件档案。该主题报道数量较少,共计247篇,且主要报道媒体为《南方都市报》,其在这一主题下共计报道190篇,占该主题的76.92%。如《美将网上公开肯尼迪私人档案》(《扬子晚报》2006-06-13)、《档案·水门事件》(《南方都市报(全国版)》2002-06-18)。

4. 学生档案。该主题共有197篇媒体报道,学生档案主要包括学生诚信档案、学生心理档案、学生电子档案、贫困学生档案等。如《矫正人格成长偏差和学业滑坡 山东高校为新生建心理档案》(《光明日报》2003-11-13)、《首次对考生建立电子档案》(《南方都市报(全国版)》2001-04-19)。

5. 珍贵历史文化档案。档案中蕴含着丰富的珍贵历史文化,相关报道共有356篇。我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珍贵的历史文化档案资源丰富,新闻媒体报道珍贵的历史文化档案一方面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加深了民众对档案的认识和理解。该主题主要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档案文献、图片、影视作品的公开、宣传、展览等,如《用档案表现历史文化 “斯洛文尼亚城市的变迁”将在北京展出》(《人民日报》2003-10-22)、《福建举办台湾义勇军档案图片展》(《光明日报》2007-07-07)。

6. 健康与社区档案。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众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问题和所在社区情况,该主题共计相关报道225篇。新闻媒体报道的健康档案和社区档案主要包括涉及不同人群的电子健康档案,农民健康档案、老人健康档案和各地的社区档案等等。如《社区六旬老人开建健康档案》(《扬子晚报》2007-08-20)、《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超七成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达50元》(《人民日

报(数字报)》2017-07-11)。

7. 战争档案。战争档案主要包括中国、阿富汗、以色列、苏联、美国、日本等国的战争报道 261 篇,其中以日本侵华战争为主,共有 235 篇,占战争档案报道的 90.04%,报道年份也集中在 2014 年。2014 年共计报道日本侵华档案 187 篇,如《吉林公开一批日军侵华档案》(《南方都市报》2014-01-09)、《侵华日军“731”部队档案证实 细菌战是日军侵略扩张的重大战略之一》(《人民日报》2014-01-11)。

8. 其他。其他主题的新闻报道共计 103 篇,主要包括新中国档案和革命历史档案,如《新中国档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中国青年报》2009-08-11)。

三、主流媒体对档案媒体形象的解读

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效果不仅限于在公众头脑中创造图像,还会影响公众对该媒介对象的态度和意见,甚至对个人的行为也有重要意义^[11](P157)。本文通过研究议程设置理论中媒介对公众议程的设置效果,初步得出媒介构建档案形象的作用过程(见图 8)。主流媒体通过设置突出档案这一客体与其显著属性,使档案形象再现,公众依靠他们头脑中对档案及其显著属性的议程做出反应,主流媒体通过对档案及其属性的铺垫^①,影响公众对档案的态度和意见,形成某种特殊的档案形象,最后对个人的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这个作用机制下,中国主流媒体主要在要闻、政治、社会等版面,紧紧围绕不同时期的社会信用档案、档案工作、名人和国际历史档案、学生档案、珍贵历史文化档案等主题进行报道,笔者通过深入研究 2000-2017 年六大主流媒体档案报道的数量、方式和主题,解读出不同阶段主流媒体塑造出的档案媒体形象。不同的阶段档案媒体形象的侧重点也不同,初步建立阶段(2000-2005 年)档案媒体形象主要体现为政治服务性,逐步完善阶段(2006-2011 年)则更加侧重于社会服务,基本形成阶段(2012-2017 年)在社会服务的基础上,更侧重于其历史记忆价值的挖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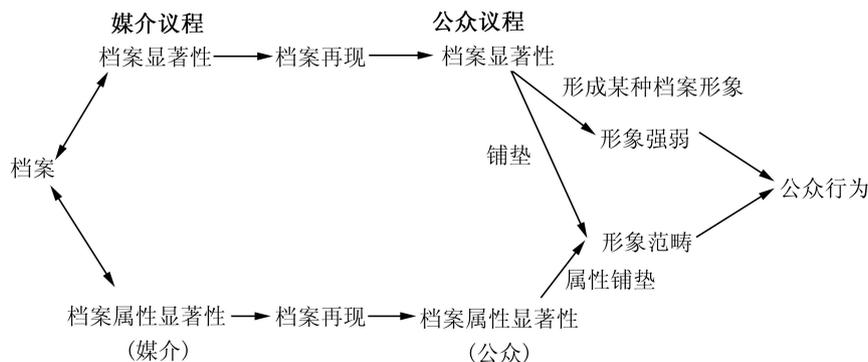


图 8 媒介构建档案形象的作用过程图

(一) 初步建立阶段(2000-2005 年): 为政治服务的幕后者

2000-2005 年是档案工作由封闭型、半封闭型转向开放型的一个阶段,转型的内容不仅包括档案的服务对象,也包括档案的开放程度。在这一档案转型阶段,主流媒体塑造出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幕后者的档案媒体形象。

一方面,从报道数量及主题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主流媒体大量报道了关于建立全国信用档案、将档案馆建设成党和国家重要档案保管基地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新闻,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档案服务于各级党政机关的形象。2000-2005 年主流媒体共报道了 516 篇社会信用档案,占有这一主题的 43.58%。“媒体报道通常将社会信用当做社会诚信和政府廉政建设的手段,较少关注商业诚信和司法

① 议程设置效果与其后对特定公众人物表达的公众意见之间的这种联系叫做铺垫^[11](P143)。

公信,这表明社会信用体系首先是作为当前社会治理和改革的工具”^[18](P153),而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也将引导公众议程,加之档案本身具有重要的行政作用,而行政的背后是政治,如果说行政是国家意志的贯彻施行,那么政治便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19](P4-7),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媒介议程设置的显著性将逐渐转移到公众议程上,进一步影响公众对档案的认识与理解,最终公众受到媒介档案议程设置与档案本身属性的显著影响,形成了为政治服务的档案媒体形象。

另一方面,早在1987年,档案法中就明确了向公民开放档案的方针,但长期以来档案开放的进程缓慢。截至2002年底,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综合性档案馆已开放各类档案3252万卷(件),只占馆藏档案总数的24%^[20](P11)。随着2003年《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施行,我国政务公开稳步推进,进一步促进了档案的开放。但整体而言,档案的开放程度仍旧不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主流媒体对档案馆开放的内容进行了一定数量的报道,但是在新闻中也反复提到档案“内部”“保密”“难以见面”等字眼,由于历史原因,以往档案馆多深处于党委、政府机关大院,档案也往往长期保密,服务于各级领导及党政机关,使得档案的保密性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综上,主流媒体在这一阶段通过不同的档案议程设置塑造出了“为政治服务的幕后者”的档案媒体形象。

(二) 逐步完善阶段(2006-2011年):为社会服务的公益者

随着政务信息公开的逐渐推进,“我国档案馆工作已完成从封闭、半封闭向开放的初步转型,档案馆的服务对象从主要为各级领导和党政机关服务扩展到为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21],且社会服务功能将作为档案馆功能建设的重要方面纳入档案事业发展综合评估工作。

2006-2011年主流媒体的档案报道共计1259篇,占有新闻报道数量的36.94%,其中《南方都市报》在这一时期共报道619篇,占49.17%。就报道内容而言,《南方都市报》《人民日报》等对档案社会服务进行了大量的相关报道,报道标题多为《档案服务百姓生活》《普通百姓成为档案利用主体》《各地档案馆拓宽渠道服务社会》等。2006年以后档案逐渐走出“深宅大院”,不断为普通百姓解决日常问题,例如通过查找工资档案找回工龄、为购买经济适用房出具证明、查阅土地林权档案、解决地基纠纷等。各地档案馆也不断拓展服务渠道,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界的需求,为社会提供各种档案服务,《南方都市报》也报道了珠海市档案馆在“公众开放日”市民可凭有效证件参观档案业务工作场所和档案保管库房,亲眼见证档案消毒、技术处理档案、整理档案等。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走进档案馆查阅档案,档案社会服务既方便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又建立了良好的社会服务形象。

但是这一时期档案报道中也存在一些负面新闻,主要是关于高额档案管理费影响工作自由流动、档案遗失引发劳动争议或无法计算工龄、档案出现多个出生日期导致办理退休遇到麻烦、档案馆发生火情及气罐爆裂事件等等,这些负面档案新闻反映了当时我国档案管理收费制度不够完善、公众的档案保管意识不强、档案馆(室)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档案部门产生负面形象。

(三) 基本形成阶段(2012-2017年):历史记忆的保管者

2012-2017年是主流媒体报道档案的低谷时期,只有2014年这一特殊年份形成了360篇档案媒体报道,为18年来最高。这是由于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钓鱼岛事件”也使中日关系日益紧张。日军侵华档案能够真实还原日军侵略罪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政治意义,将日军侵华档案进行整理、出版并向公众开放是为了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捍卫人类尊严。《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大量报道了各省档案馆的日军侵华档案及相关出版物,用原始、真实的档案还原真相,让公众铭记历史。同时,主流媒体对日军侵华档案的传播也将加深公众对档案的认知,了解各省市档案馆保存着丰富而又珍贵的档案资源,这些档案真实地记录了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保存着民众的历史记忆。正如以色列学者佩里所说,媒体知道如何讲故事,并且它们比传统的记忆方式更加擅长创造奇迹^[22](P106-124)。主流媒体通过挖掘档案中重大历史事件,让公众铭

记历史、保留记忆的同时,也塑造出了档案作为历史记忆保管者的形象。

但是,这一阶段主流媒体的档案报道内容中,有两个备受主流媒体关注的议题。一是人事档案保管费的问题。人事档案保管费长期以来深受公众关注,但从2012年开始出现大量相关报道,2012年《人民日报》报道了人事档案保管费标准平均降幅近40%,但事情并未得到平息,2014年8月《南方都市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就档案管理费该不该取消进行了相关报道。直至2014年12月,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档案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自2015年1月1日起,取消收取流动人员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人事档案保管费的问题才算最终解决。二是干部人事档案造假。干部人事档案造假乱象之严重可以从主流媒体报道的大量案例中看出,干部人事档案造假多次严查而屡禁不止,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2015年,中央组织部就干部人事档案造假问题出台了《干部人事档案造假问题处理办法(试行)》,不断强化档案管理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但归根究底,是公务员档案诚信问题,因而2017年以来,多个省份纷纷出台加强政务诚信的相关文件。这说明主流媒体能够及时捕捉社会热点、公众困惑,然后进行专题报道后间接推动国家档案局、各省档案馆等完善档案管理制度,但此时档案机构更多的是处于被动的局面。

四、档案媒体形象的优化路径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及档案事业发展阶段,档案媒体形象也会发生不同的转变。主流媒体对档案媒体形象的塑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通过主流媒体塑造档案媒体形象还有两个弊端。一是主流媒体的档案报道中仍旧有不算少数的负面报道,例如干部人事档案造假、档案丢失遗失问题。这些负面报道将会一定程度上破坏已建立的提供社会服务、保存历史记忆的良好形象。二是由于档案机构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较低,档案机构只能被动地关注主流媒体给他们的议程设置,再通过回应主流媒体报道出来的相关问题来为社会公众服务,而档案机构希望传达的话语常常没有被传达或关注,容易造成主流媒体档案报道的被迫传达与传达缺失等问题,公众难以建立起一个较为准确而全面的档案媒体形象。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 双向对话: 媒体合作与公众交流

媒体的负面报道会极大地影响档案的形象,这需要档案机构广开交流之门,主动与媒体、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及早发现、解决问题,从而提升档案服务社会水平,从根源上减少档案负面新闻。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媒介议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的意见,主流媒体的宣传有时甚至能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因而档案机构应该积极和媒体进行交流,了解公众舆情动态,在负面事件发生后及时通过媒体解释问题,避免以讹传讹,影响档案形象。乔治·莫里斯在《从容面对媒体:让你的媒体亮相尽善尽美》一书中研究了如何面对媒体、如何利用媒体的具体问题,还特别说明了与不同媒体打交道时应该注意的问题^[23]。这说明了面对媒体需要用到合适的方法和策略,了解媒体的运作模式,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基本原则,根据媒体运作规律和媒体办报宗旨制订合作方案,实现媒体与档案合作式传播,才能使档案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充分得到利用,塑造出更全面清晰的档案媒体形象。

正如亚历山德拉·伊夫莱所言,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的公众形象迫切需要改革,只有当公众意识到档案的真正价值和重要性时才能真正改变^[24](P105-108),因此档案机构应该积极与公众交流,普及档案知识,使公众真正了解档案及其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公众的档案诚信意识,才能从根源上解决档案造假的问题,也能避免很多其他可能出现的公众困惑,同时也能提升档案的整体形象,提高公众对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的认同感。以新加坡国际档案馆为例,档案馆致力于扩展利用服务以及普及档案知识的工作,构筑内容广泛的信息存储交流体系、扩大档案馆用户群体,使得档案工作从一开始的鲜为人知转变为现在得到许多人的认可,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认同^[3](P70)。

(二) 主动优化:主动传播与多元服务

档案馆及档案工作者如何进一步优化档案的媒体形象,有效提升和扩大档案的社会影响力,提高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认同,是目前我国档案馆及档案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借用政府形象的定义,档案形象是由档案机构自我构建的形象、社会公众所认知的档案形象和媒介所再现的档案形象(即档案的媒介形象)这三个互相影响与渗透的部分组成^[25](P17)。媒体对档案形象的传播是以档案机构自我构建的形象为基础的。因此,要优化档案的媒体形象,首先要将被动形象传播转变为主动形象传播,主动向新闻媒体发布档案信息,完善档案新闻发布制度,妥善处理好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使档案形象的传播效果事半功倍。如2014年辽宁省沈阳市档案局将档案新闻发布纳入市政府新闻发布体系,每年都由各级档案局(馆)指定新闻发言人,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发布重大档案信息^[26](P40-41)。其次,要实现服务内容与模式的丰富多元化。“公众对一个组织的感知和认识90%取决于其所作所为,10%取决于其所言所说”^[27](P109),新闻媒体再现档案形象时,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压力和影响,同时媒介作为社会力量的一种,在当今社会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25](P17),所以媒体再现的档案形象不一定与档案机构自身构建的形象一致,这时需要让公众切身感知到档案机构的作为,进一步优化档案形象,实现档案服务内容与模式的丰富多元化。根据公众需求不断丰富馆藏,使档案服务形式更加多元,尽可能方便档案利用者,如青岛市档案馆的现行文件服务中心创造性地开展了查询跟踪服务、聆听服务等多种服务方式,为档案利用者解决了很多困难,树立了良好的档案形象^[20](P13)。

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不仅能够构建公众对档案的认知图像,影响公众对档案的态度和意见,还会对个人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其中主流媒体对档案媒体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六大主流媒体再现出的档案媒体形象为:为政治服务的幕后者、为社会服务的公益者和历史记忆的保管者,但也存在一定的诸如档案造假、档案遗失的负面报道。为了优化档案媒体形象,档案机构可以通过与新闻媒体、社会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实现档案机构与媒体的双赢,提升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再将被动形象传播转变为主动传播,不断提升档案服务内容和模式的丰富多元化,通过完善档案机构自身服务水平来提高档案的地位和社会认同,进一步促进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巧玲,谢永宪,孙爱萍等.国家综合档案馆公众形象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地区的问卷调查.档案学通讯,2015,(2).
- [2] 程结晶,朱松涛,彭小芹.档案馆形象塑造现状的调查分析.档案学研究,2012,(6).
- [3] J.奇.档案工作的社会形象和公众的档案观念.朱虹译.档案学通讯,2001,(1).
- [4] 中国产业信息网.2016年中国报纸十大品牌企业排名(图),2016-4-19.[2018-11-17]<http://www.chyxx.com/top/201604/407626.html>.
- [5] David M. Blei, Andrew Y. Ng etc.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2003,(3).
- [6] 叶春蕾,冷伏海.基于引文—主题概率模型的科技文献主题识别方法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9).
- [7] 徐康.基于主题模型的文本情感和话题建模的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 [8] 彭雨龙.基于VSM和LDA模型相结合的新闻文本分类研究.山东工业技术,2016,(6).
- [9] 王洪伟,高松,陆頔.基于LAD和SNA的在线新闻热点识别研究.情报学报,2016,(10).
- [10] 程曼丽.论“议程设置”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舆论导向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 [11]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2] 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06-2-6.[2018-11-17]http://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1164.htm.
- [14] 宣宝剑.媒介形象.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 [15] 陈雪奇,郭静雯.《人民日报》与“@人民日报”新闻传播机制的对比分析.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14,(3).

- [16] 谭必勇. 建立我国诚信档案管理制度的探讨. 湖北档案, 2004, (Z1).
- [17] 林均跃.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十年建设历程和取得的成就. 信用经济与信用体系国际高峰论坛, 2009.
- [18] 马晓月, 莎泽塔·艾哈迈德, 朗跃.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舆情与实践. 刘晓玉译. 国外社会科学, 2018, (2).
- [19] 高大伟. 档案学研究中的政治话语初探. 档案学通讯, 2013, (5).
- [20] 冯惠玲. 开放: 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 档案学通讯, 2004, (4).
- [21] 李海秀, 吴春燕. 档案馆要走出深宅大院. 光明日报, 2006-03-05.
- [22] Yoram Peri. The Media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Yitzhak Rabin's Remembrance. *Journal Communication*, 1999, (3).
- [23] 乔治·莫利斯. 从容面对媒体: 让你的媒体亮相尽善尽美. 宋华勋, 宋华劼, 岳岩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
- [24] Alexandra Eveleigh. Recent Annual Reports: The Public Image of Archive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1999, (1).
- [25] 张宁. 中国转型时期政府形象的媒介再现. 上海: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26] 马风云. 沈阳市探索档案新闻发布机制. 中国档案, 2015, (6).
- [27] 格伦·布鲁姆, 艾伦·森特, 斯科特·卡特里普. 有效的公共关系. 明安香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Political Service, Social Service and History Memory: Portrayal of Archives in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since New Century

Tan Biyong, Zou Yanqin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Portrayal of archives as presented in mainstream media both reflects the social status of archives and influences the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nd perceptions of archives and archival work, as well as personal behaviors of the public. Reports on archives in six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from 2000 to 2017 show that archives are presented as the medium for publicity, non-for-profit to serve the public, and the custodian of history memory.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archival portrayal in mainstream media may be solved as following ways: first, having dialogues with the public and co-operation with media; second,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optimize communication and to start multiple services.

Key words media image; reports on archives; mainstream media; history memory

-
- 收稿日期 2019-07-04
- 作者简介 谭必勇, 管理学博士,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山东 济南, 250100;
邹燕琴,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桂 莉 涂文迁